



—— 四川省人民政府 —— 四川省人民政府 ——



本辑编审人员:

主 编:胡尚知

责任编辑:李蓝天

主 审:张明清

审 稿:廖良臣 蒋廷举 屈景益

校 对:李蓝天

目 录

一九五二年“松既事件”始末	黄恒铤 (1)
“松既五二事件”的回忆	张光远 (20)
“松既冤案”史略	龙安中 (28)
肃反运动两案	孔孝忠 (40)
蒋先法——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好县长	蒋祖钧 (43)
回忆王立行同志	张新柳 (52)
附：王立行同志生平	(57)
教导队的始末	林隆华 (60)
永川诗词学会简介	周明扬 (63)
松既政协委员联络组的成立和发展	刘炎文 (69)
要让古镇松既旧貌换新颜 ——松既政协委员联络组建言概述	刘炎文 (76)
永川上游水库创建情况	罗忠海 (80)
何埂区推广双季稻高产技术纪实	龙安中 (86)
“文革”中永川城的两次大规模武斗	唐继林 (90)
文化大革命见闻录	屈景益 (93)

旧时民俗杂谈.....	蒋廷举 (98)
消失的松溉马帮及其服务行业	龙安中 (113)
往事漫忆(续)	邹隐樵 (115)
中华复兴社简况及我的活动	
策动起义为解放重庆服务	
杂 录(待续)	张义富 (141)

一九五二年“松既事件”始末

黄恒毓

县政协文史组印发了张光远同志撰写的《松既“五二”事件的回忆》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纷纷要求了解“松既事件”的全貌。应读者的要求，县政协文史组前往松既组织了有中共松既镇委书记袁庆国、副书记张永凤、镇长钟良才和部分当事人参加的座谈会，又经个别走访，全面搜集了资料，并在县档案馆查阅了有关材料，整理出《一九五二年“松既事件”始末》一文，用供参考。

松既镇濒临长江，是永川五十年代前唯一的一个水码头，也是永川南路上通泸州、宜宾，下达重庆的交通枢纽。镇上原有五千多人口，商号林立，市场繁荣，其地位仅次于永川县城。抗战时期，国民党“新生活运动总会”所属“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曾将松既划为“实验乡——纺织实验区”，直属三区专员公署管辖，开办“新运纺织厂”和农场。“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曾亲临松既进行过视察。当时松既达到繁荣顶峰。

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溃退，部分溃军化为土匪，四方蜂起，进行抢劫。1949年农历10月，土匪抢劫松既镇，并放火烧毁街房数十间，居民遭受重大损失。解放后，新政权建立，第四区区公所设在松既，松既又成为第四区的政治中心。是时大股土

匪暴乱，不仅四处抢劫，甚而攻打松溉区公所和镇政府，百姓又一次遭到浩劫。经过请剿土匪、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等民主运动，工商业逐步恢复和发展，群众安居乐业。松溉还一度划为县直属领导。正在这时，松溉连续发生了大冤案，使群众再度遭受灾难。这次连续发生的大冤案，过去合称为“松溉事件”，其经过情况如下。

“奸商集团”案

这件事还得先从胡叔伦谈起。胡叔伦，乃松溉培善堂中药铺的店员，由于脚有点跛，绰号“胡跛子”。此人虽然相貌丑陋，但却能言会道，善于吹捧；浑身穿戴像一条“烂龙”，却被镇领导视为“艰苦朴素”的工农本色，因而得到器重。他不仅担任了店员工会的主任，还是松溉镇工会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掌管领导全镇7个工会的大权，成了实际上的“一把手”（主任由镇长兼）。胡叔伦的父亲是地主，在减租退押时，因逃避农民的斗争，潜来松溉，租用益群伞厂后面的房屋居住，胡叔伦不仅没有报户口，还要求曾银武安排其父到益群伞厂工作。曾银武系学徒出身，后来自营恒昌纸号，自做自卖。他为人正直，解放后被群众推选为段长，工作较为积极。他为组织群众就业和发展工商业，合伙集资和贷款开办了益群伞厂，并任伞厂经理。曾银武未按胡叔伦的要求安排其父到伞厂工作，还去公安派出所检举揭发，胡叔伦受到了批评，这样就种下了祸根；加之曾银武经营的“恒昌纸号”薄利多销，多次贱价出售商品，这又与胡叔伦主持的“工人书店”形成对立，祸根也就越结越大。

1952年3月18日晚，曾银武同伞厂副经理温治伦及几个工人在潘继龙面馆吃酒，酒后温治伦带着几分酒意与陈焕文为了伞厂50斤油的债款条子发生争吵。回到益群伞厂时，看到店员工会办公室（在益群伞厂楼上，与伞厂隔壁）门开着，就到店员

工会办公室找副主任胡叔伦解决纠纷。适逢胡不在，而有店员陈光明等4人在场。温问：“治安组是哪些人？”陈光明用手电筒指着墙上贴着的名单说：“这就是”。温治伦就胡乱地抄写了治安组人员的名单。曾银武在楼下听到温治伦的闹嚷声，就到楼上招呼温去睡觉，并与其它几人谈了一阵才各自离开工会回家。当夜12时，胡叔伦和店员工会副主任梅静思却歪曲事实，向镇公安派出所所长陈家发报案说：“曾银武和温治伦趁工会治安组出外巡察之机，将门拨开，盗窃文件22件（工人们收集奸商的违法材料）；正在抄录治安组人员名单时，治安组巡察回来，当场将其捕获”。陈家发所长自己不到现场勘察，也没派员前往，竟听信片面之词，同意将人扣押。一个假现场，哪能扣押人呢？次日早晨，胡叔伦又以同样谎言向镇长李占儒报告了案情，李镇长当即报告中共第四区区委转告中共永川县委。是日下午，胡叔伦并没有得到县、区的指示，就以店员工会的名义书面通知曾银武、温治伦开会。曾、温到会后，胡叔伦首先向温来个“当头棒”，说：“昨夜曾银武请你吃酒，指使你来盗窃文件，抄写治安组名单，陷害工人？”温不承认，曾自然更不承认。胡就把曾和温逮捕起来送公安派出所。所长处理更简单：“这里没有地方拘留，给他们带上手铐，暂时送到搬运工会扣押起来。”就这样“合法”地真把人扣押起来了。扣押的第三天，以胡叔伦为首组织了主席团，在店员学习会审讯曾银武和温治伦，地下摆着各种刑具，开始对温逼供和诱供。温治伦否认事实，胡的亲信便插嘴帮腔：“你原是店员，上了曾银武的当，坦白了与你没有关系。”温还是没有承认，梅静思又拿着刑具对温说：“看你滚松的面还是滚紧的面？”温已经带了两天的两夜的手铐，怕再受刑，被迫承认了。继而审讯曾银武，首先将曾的衣裤脱去，两人挟着他两臂，用脚踩着两腿，跪在煤炭花上，再逼着温治伦抵着曾说：“你指使我盗窃文件，抄写名单！”胡叔伦的另一亲信又出来“证明”曾组

织“奸商集团”。曾银武不承认，胡叔伦就施用“扳螃蟹”等酷刑。曾在残酷的肉刑下被迫按胡叔伦所问的事情承认了。接着胡叔伦又逼曾银武交出“奸商集团”的名单，曾先说了一个小商贩，当即遭到胡的破口大骂：“狗日的，光说小的不说大的。”曾马上反问胡：“你叫我哪格说嘛”？胡答：“你从文昌宫梯坎下说赶走”。曾就按照胡的指点挨门逐户的咬了27个较大点的商人。审讯停止后，将曾银武押回店员工会关起。当夜，胡叔伦和梅静思二人布置亲信在被咬的商人门上写标语，次日被咬的商人见自己的大门上写着：“×××大奸商，你们的阴谋诡计，已被我们揭穿了，赶快来坦白吧！坦白是生路，不坦白是死路一条！”商人们对这飞来之祸无不惊惶失措。

3月22、23两天，先后在搬运工会和松既中学传讯了被曾银武所咬出的商人，镇长和派出所长讲了话，松既中学校长唐梦怀应邀列席。这次传讯，通过严刑拷打，又咬出50余人，前后共计咬出80余人。经胡叔伦审查时，勾掉了一部分小商贩，留下33个作为“奸商集团”的成员。这样，所谓“奸商集团”就产生了。胡叔伦和梅静思又组织曾银武游街示众，给曾戴上高帽子，叫曾边打锣边说自己是“奸商”。游街后继续拘押。接着胡叔伦又组织主席团审讯所谓“奸商集团”张光远等33人，逼着供出“奸商集团”的组织情况，不招供者就用严刑拷打。陈孟恭、刘太昌、王正容、凌承楷4人经过审讯后释放回家，因在路上摆了几句“龙门阵”，被派出所一干部发觉，又以“组织第二次攻守同盟”的罪名予以逮捕。这事发生以后，所长陈家发竟在群众大会上宣布：“任何人不能在街头巷尾交头接耳，更不许乱反映，如有违犯者罪加三等！”从此以后，松既的群众就失去了说话的自由，如在街上碰到熟人也只能用手势招呼一下。

县领导得知松既发生的事情后，于24日电话通知镇长李占儒到县汇报，经研究后，叫李当夜回松调查。25日县公安局又

派赵华、宋国修去松既调查。赵华去松后，不仅偏听片面之词，而且又用1天的时间，以逼供的方式审讯了20几个商人。其中除曾银武、张光远、陈孟恭3人坚持否认外，其余都承认了“奸商集团”。赵华就认为是真实材料，于次日回县向县长钱文涛、公安局长闻立修作了汇报。27日赵华去专署公安处报告案子，处长批准逮捕拒不招供的曾银武、张光远、陈孟恭3人。30日赵华回松既召开群众斗争大会，斗争曾银武、张光远、陈孟恭，斗争后即押送到县（其余“奸商集团”成员交群众管制）。在县里的审讯方式亦不亚于在松既的肉刑办法，经赵华审讯不承认者，就带上手铐脚镣，再不承认，就给带上双的，还不承认，就再加刑。曾、张、陈受刑不过，只好一一招认，并承认备有毒药企图毒害工人。花样既已翻新，赵华就逼他们交出毒药，他们当然交不出来。接着赵华便赶到松既逼商人们交出毒药。赵华在会上说：“不管你们交出什么药，只要能毒死猪和狗的就交，交不出就脱不到手。”同时逼迫吴克裡（所谓毒害组长）交出毒药。吴被迫交出“毒药”，试验结果没有把狗毒死，赵华把药瓶扔破，大骂一顿，把吴交给店员工会去追查。一个店员在看守吴克裡的时候，由于对吴有成见，借机报复，将吴吊起，哪知一个人吊一个人是不好吊的，结果使吴跌下来摔断了腿，这又成了吴克裡“企图跳楼自杀”的罪行。逼了吴克裡，赵华又去逼宋志远（所谓情报组长），并当着商人们说：“宋志远交不出毒药来，你们全体负责。”宋被逼得无路可走，才商议由几个医生用红砒、白砒、川乌、草乌配成毒药给他上交。但宋怕加罪，不敢交出，又由28个商人向宋出具保证书：“如果政府判你的罪，我们愿受同样的罪。”这样，宋才将毒药交出。赵华用来试验，毒死了1条狗，于是将其作为“确凿证据”，携带回县。

5月7日，经县领导同意，由赵华电话通知松既派出所叫“奸商集团”的人，到县参加由赵亲自掌握的“永川县奸商攻守

同盟自新登记训练班”学习。县领导之所以同意把被咬的商人集中参加“永川县奸商攻守同盟自新登记训练班”学习，意图是经过学习，打通思想，交代真实情况；但赵华却把商人当成囚犯，继续刑讯逼供。商人们被迫都一一按照陈孟恭的坦白承认了。陈孟恭在5月4日就作了这样的“坦白”：“……1952年3月16日，以曾银武、张光远、曾仲贤（曾银武之弟）、孔异呈、陈孟恭为首组织‘抗拒五反同盟会’。先是3月14日下午陈孟恭遇着上述人在恒昌纸铺，经曾银武、曾仲贤介绍重庆、白沙五反搞得很凶的情况，商议组织抗拒，决定15日分头约集，16日在恒昌内院开会。曾银武致开会词，次为张光远、曾仲贤、陈孟恭发言。除建立总务组、组长张光远，组织组、组长曾银武、情报组、组长宋志远，文书组、组长陈孟恭，毒害组、组长吴克裡外，推曾银武、张光远为主持人。该同盟有22个组员。陈孟恭作记录，记录本当天交与张光远，张光远闻事败即行烧毁。3月18日晚，曾银武邀约温治伦吃酒，利用与工会两隔壁关系，盗窃材料22件，抄写了治安组名单交给曾仲贤手……”陈孟恭还交代了“第二次攻守同盟会议”。商人们按照陈孟恭的“坦白”承认后，赵华就逼他们交出会议记录本。曾仲贤就硬着头皮说“记录本在店员吴灿模处保存起的”。赵华派人随曾仲贤回松既取记录本，曾仲贤又只好“假就假过去”，造了本假的会议记录交出来。谁知胡叔伦还不放过，还要追查在“吴灿模处保存起的”那一本，强迫吴交出来。吴灿模是曾银武的店员，吴向胡叔伦指出：“奸商集团是假的，根本没有记录本。”胡叔伦就以“包庇资方，没有立场”为由，开除了吴灿模的工会会籍，并主持严刑拷问吴几个昼夜。

赵华把所谓搞出的“成绩”，向钱县长作了报告，钱县长为了教育工商业者，叫陈孟恭在城区工商界作了“典型报告”。

按政策规定松既是不搞“五反”的，县里也没有批准松既搞

“五反”。“奸商集团”事件主要是胡叔伦挟仇报复，伙同梅静思捏造事实，加之领导的官僚主义和干部的违法乱纪造成的。所谓盗窃文件先说是 22 份，后又说是 8 份，最后又说只是怀疑。从商人手中追出来的“文件”和“会议记录”完全是曾仲贤在被刑讯逼供下一手写成的。所谓 3 月 14、16 两次曾银武在益群伞厂和恒昌纸号，召集商人开会组织“奸商集团”，益群伞厂根本没有人去开过会；况且 3 月 14 日曾银武还在泸县购货，而 3 月 16 日在恒昌纸号开会工商联准备迎接“五反”开的小商贩会，“奸商集团”中的 33 人这天没在这里开过会。温治伦是酒醉后抄写的名单，除两个名字可认出外，其它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而且那些人温也相识，并不是什么秘密，抄名单也是没有意义的。赵华不仅在“奸商集团”上搞“逼、供、信”，还把反革命分子王懋忠（先已在押）所交代的土匪材料作为根据，硬要 33 个商人承认组织土匪情况和供给土匪粮食、枪弹等物，因此又产生了后来的“追匪赃运动”。

“逃避‘五反’结义社”

这是一个插曲。在逼出“奸商集团”的过程中，长航松既木船工会也发生了类似事件。木船工会代表冷奇才 4 月 18 日向镇公安派出所报案：“以船户龙海林为首组织‘逃避五反结义社’，指使其子龙光祥悄悄闯入工会，盗窃文件和图章。”其时各船户正在重庆参加“五反”学习。所长陈家发随即向公安局报告，公安局秘书室刘家兴回答：“要与水上派出的联系，研究处理”。陈又即向江津县朱沱（朱沱当时属江津）水上公安派出所驻松既的张同志联系，张表示“向县里汇报，看县里指示怎么办”。陈迫不及待地又向县公安局刘家兴、赵华联系，刘、赵的回答是：“牵涉到水上问题，要报请地区公安处指示”。陈家发没有等到公安处指示，就擅自同冷奇才把龙光祥拘捕。次日，冷奇才又诬告

“逃避五反结义社”的船户邹绍荣是“反革命”分子，于是派人持着工会公函，通过镇人民政府和公安派出所，去重庆逮捕了邹绍荣。下旬，其他船户参加重庆“五反”学习结束后陆续回家，冷奇才派人拿着绳索、手铐和棍棒到东狱庙下面等着，看见船户过来就铐着或捆着架走，扣押在木船工会。然后与胡叔伦、梅静思勾结，在木船工会、店员工会多次审讯，要船户承认“组织‘逃避五反结义社’，派龙光祥盗窃文件和图章”。船户都不承认，冷就采用严刑拷打，12个船户受到13种不同程度的肉刑，被迫承认了组织“逃避五反结义社”，并交代了“社”内组织、造谣、毒害、闷棒、文书等组及其各组组长名单。冷奇才逼出“逃避五反结义社”后，洋洋得意地向群众说：“我们工人法庭天天开起，谁个乱说就审讯他”。群众自然不敢说话。这事发生后，江津朱沱水上公安派出所的彭贵到木船工会责问冷奇才为啥子扣押这么多人？冷竟叫喊“派出所关不到火！你不听招呼，摸你的屁股！”把彭轰走了。冷奇才把船户少者扣押7、8天，多者40余天，还勒索船民人民币440万元（旧币）。最后，将龙海林等4人送派出所扣押反省，其余交群众管制。在被扣押和被管制中，都被派到一些单位去“劳动改造”。

冷奇才就是木船业中的流氓分子。他诬陷船户的原因是很多的，其中之一是：1952年农历正月，松溉15个船户承运粮食公司一批红粮到奉节，合同规定运费和工资按松溉标准计价。到奉节后，工人见奉节价高，要求每天给补助5000元（旧币），船户不同意。经过争执，多数船户感到多等几天费用更大便同意了；而邹绍荣、龙海林等坚决不同意。后经当地劳动部门解决，动员工人按照合同办事，退还了增加的补助。回到重庆，又经有关部门解决，最后双方协商每人发给18000元的补助费。冷奇才为此对龙海林和邹绍荣怀恨在心。他和邹绍荣又有债务纠纷，大吵过几次，更想寻机报复。因此，捏构了“逃避五反结义社”这段冤

情。

“追匪赃运动”

在搞出“奸商集团”后，升任公安局审讯股长的赵华，本已算大功告成，但又节外生枝，利用反革命分子王懋忠“以毒攻毒”，再搞了一个“追匪赃运动”，从而制造了一个更大的冤案。

王懋忠乃解放前松既镇镇长，罪恶累累，民愤极大，土改时只判了十年徒刑，带回松既宣判，群众认为判轻了，意见大，又带回城关押，令其进一步交代罪恶。赵华利用王懋忠“以毒攻毒”，以王懋忠在监狱里所捏造的“2月17日在仓房吃血酒，组织反共保民军，3月28日在东狱庙分匪赃”的材料作为根据，首先要在押的陈孟恭坦白。陈孟恭不承认当土匪的问题，赵华就指着王懋忠交代的材料说：“你看，这是证据，还敢抵赖吗！”陈见材料上有自己的名字，又是文书组长，于是便按所示材料“2月17日在仓房吃血酒，组织反共保民军”的情况把谁任总司令、副总司令、参谋长、副参谋长，总务、文书、军需、供应、情报、医务等各股股长人员，大队长、3个中队长人员编造了一套；把2月16日攻打区公所，谁任司令、副司令、参谋长、顾问、3路指挥、情报长、3个情服组长等等人员也编造了一套；把“3月28日在东狱庙分匪赃”又编造了一套去搪塞。赵华对陈孟恭的“坦白”十分满意，叫陈在“奸商攻守同盟自新登记训练班”有系统的作典型报告。赵华又培养参加“训练班”的4个商人为积极分子，要他们也带头坦白，否则就要动刑。这4人只得模仿陈孟恭的“坦白”而“坦白”。接着赵又把其他20多个商人分成4个组进行坦白。赵华一方面用刑威逼他们承认，另一方面则利用在押的张洪昭（已平反）和反革命分子史天运去“动员”商人们“坦白”。商人们也就千篇一律的承认了，满以为坦白了就松了，没想到越陷越深。赵华抓住商人们的“坦白”追问

商人：“你们组织土匪、支援了土匪一些什么东西？”张光远被迫供出“40天共供应棉纱70并，银元450元，人民币25000万元，土酒800斤，菜油1500斤，黄谷1万斤，碛米16500斤，电筒200支，盐2000斤，被盖850床，鸦片350两。”赵华一步紧一步追逼：“商人就是唯利是图，你们支援土匪，就是为得更大的利润，难道你们没有分匪赃吗？只要坦白就不追究。”商人们以为真的不追究，并且只承认支援不承认分匪赃看来也过不了关，于是又都承认了。据1952年5月21日“永川县奸商攻守同盟自新登记训练班”的《总结报告》对松既参加训练班的商人们的“坦白”统计：支援土匪的物资达51种，大的有枪弹、金银、棉纱、谷米等，小的有黄花、耳子、芋片、豆办、鞭炮等，其中还有公债5份（清剿土匪取得胜利后人民政府才发行折实胜利公债，这里怎么就用公债支援土匪呢）！《总结报告》中对商人们所分匪赃也有统计，计大小50种，连镜子1面，菜盒1个，牙刷1把，牙膏1支这些都统计上了。分了匪赃不退赃是不行的，于是赵华又向商人们说：“你们分的匪赃，是人民的血汗，只有退还给人民才会求得宽大。”商人们则认为反正是“打垮经济，挤干了事，退了赃物免得人吃亏”，又都承认退赃。本来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是不搞清退匪赃的，赵华却向钱县长报告说，“他们自动要求把赃物退还给群众”。钱县长答复说：“你再考察一下，若真是愿意退还群众，可以嘛。”赵华得到了“圣旨”，便于5月下旬先后分批释放商人回松既退赃，他随最后一批释放的也赶到松既进行追赃工作。通过种种高压手段和其它恶劣方式，整得商人哭的哭、叫的叫，才把“赃物”追出。赵华又向钱县长假报告说：“商人退赃很积极，都自动交出来了，看怎样办？”钱县长自然也干脆答复“叫群众来领去。”赵华于5月27日至30日在松既中学举办了““匪赃展览大会”。

“匪赃展览大会”由胡叔伦报告展览的意义和破获“奸商集

因”的经过；李占儒宣讲政策，号召“奸商”带罪立功；赵华报告31个“奸商”的思想改造过程，号召“奸商”立功赎罪，否则还要带回永川坐监。展览了4天，去“参观”展览的人都愁眉苦脸，而且没有一个人去认领。然而赵华尚不醒悟，又召集“奸商”开会，逼他们“立功赎罪”，并说：“谁不积极，就带他去坐监”。于是这场戏就越演越烈，商人们也就不惜诬害好人，一个咬几个到十个，遍街乱喊：“某某，你参加仓房吃血酒，东狱庙分匪赃，赶快去坦白”。群众把这称之为“喊匪赃”。有的被咬者不知该怎样坦白才好，咬者就把写好的材料给他，叫他照着坦白。商人毛定国喊某人交待匪赃，被12段治安组长斥责说：“你这家伙，他税都没交清，还在这里乱喊”。毛定国急忙说“喊错了，我另外喊一个”。伪军警人员、窃据过段上领导和船工组文书、诈骗钱财和诱奸估奸过妇女7人的刁乾元，乘机大肆喊群众：“反正是打垮经济，丢掉包袱，走无产阶级的路，你们都承认吧！”刁乾元同派出所所长、镇长在镇人民政府设立公堂，由温治伦、刁乾元主审，每天传讯被咬的群众交代土匪和匪赃问题。有不承认的，其他商人就在旁边“作证”，如瞎子聂权山在公堂上说：“我瞎子哪里去抢过人分过匪赃啊？”其他商人就在旁边证明说：“在东狱庙分匪赃时，你挑选大的一堆，现在还不坦白呢！”坚决不承认的就用刑拷打。连续刑讯了24天，还是有许多不承认的，就召集被30个“奸商”咬出的260多人在镇政府开会，号召大家坦白，并分成7个大组讨论；又由30个“奸商”坐堂审讯，不承认者仍受严刑拷打，整得来天愁地暗惨叫连天。各代会代表、医协主任、模范军属龙志云被咬，李占儒和陈家发亲自动员坦白，龙斥责他们说：“我不但能保证自己没当土匪，就是咬我的人我也保证他们没有当过土匪，都是你们逼出来的。”这还了得，“阻碍运动”，照样惨遭严刑逼供不误，龙被迫承认了。像龙这样的头面人物都被迫承认了，其他的人也就跟着顺流

而下了。经过半天一夜的坦白大会，又有 360 多人承认当过土匪，愿意退赃。其余尚未被咬的群众，则更加相顾失色，惶惶不可终日。

在清匪赃的全过程中，计有 142 人受刑。共计追出衣服 900 件，被子 175 床，蚊帐 50 顶，棉衣、皮袄 259 件，人民币 3923.6 万元，金戒子 18 个，棉纱 13.5 并，银元 616 元，其他木器用具等 2599 件。其中有的交出土改分的胜利果实，有的交出新婚嫁妆，有的工商业者交出生产工具和货物，共装了两个火车皮运到县城贱卖。许多人被退得来家如水洗，吃不上饭，睡不上觉。松既被一片恐怖气氛笼罩着。

追匪赃任务完成，赵华一伙自认为是“巨大功劳”。赵还说是他进军西南的“第二件大功”。其余也分别评功：温治伦评为“特等功”，刁乾元评为“甲等功”，“奸商集团”的人也分别评为“乙等功”或“丙等功”。最后，陈家发布了一个“违法人员学习会”，迫令“分匪赃”的人和伪党团分子、地反分子家属一起定期集中学习，并宣布全部管制起来。许多善良的人又这样失去了自由。

后来经过查证，被迫退赃的 294 人中，只有 8 人是“自新土匪”，33 人是打过“油火”的。

“肃毒运动”案

1952 年 9 月，松既与全国各地同时进行了一次肃毒工作。8 月份动手摸底，李占儒依靠反革命分子刁乾元和惯匪、乡队附曹荣高等 4 人搞出材料，向公安局长闻立修报告。闻认为“还不错”，在干部大会上表扬了李，并批准李使用刁乾元等坏人。8 月上旬，闻立修去松既检查工作碰着李占儒等正开会研究材料，闻看了材料认为不具体。李立即通知在何埂的曹荣高返松，布置他与刁乾元等写成详细书面材料。8 月 12 日陈家发从县整风回

松（李占儒到县整风）掌握摸底工作。强迫全镇成年人交代历史：18岁以上的不分男女，填写《各阶层思想历史交代登记表》和《自传》各两份，叙述从8岁起的经历，说是为了“思想改造”。据全镇16个段中13个段的统计，有1923人填了《表》、交了《自传》。陈的意图是想从其中摸出底来，结果什么也未弄出来，仍然将刁、曹等写的假材料送公安局转报公安处。专署公安处对松既报的材料怀疑，派侦察科长带了人到松既检查。这位侦察科长在松既20余天，住在派出所，不深入群众调查了解，只听少数干部和坏分子的话，到运动正式开展才离开松既。这位科长离松时与县委、县公安局联系说：“材料对证后，基本上没有出入。”县委就根据“没有出入”的材料，于9月3日一次就批准逮捕46人；公安处又批准逮捕13人，9月5日以后又陆续报批逮捕59人，前后共捕118人（内有16人批准捕未捕）。

在运动的过程中，陈家发最相信坏分子说的“我们最清楚镇上贩烟的人，保证给你清出大量烟毒”的话，最相信自己的“以毒攻毒”手段，所以指定刁乾元负总责指挥，其余3个分住各段限期搞出烟毒。这几个坏家伙在所长的支持下，简直是如虎添翼，大兴云雨，胡说：“肃毒和三反五反一样，都是打垮经济，坦白多者从宽，坦白少者从严。”他们仍然刑讯逼供，非刑拷打，有61人遭到他们施用的肉刑。在刑讯中，他们还向受刑人说：“你们不知道坦白了对政府有利吗？你们可以往有钱人的身上推。看你愿坦白，还是愿受罪。”妇女康素清被吊颈身死，何玉仙遭毒打死去活来两次，最后投江自杀幸被船民抢救。公安处一干部竟将坏分子捏造的材料发给段干部去检举揭发，迫使群众不得不“坦白”。一个段上的年轻治安干部是卖猪肉的，被检举为“卖大烟”，把卖肉的帐本算着卖大烟的帐本，数量是以斤计，也就当着大烟犯来整。这样，全镇“坦白”贩毒、开烟馆和吸毒者竟达1200余人，几乎平均1户1人。被逮捕的竟占全县逮捕烟毒犯总